

三十年来中国语言工作的一些情况*

——在日本中国语学会演讲会上的讲话

詹伯慧

会长先生,各位教授先生,各位朋友:

首先我要感谢会长先生安排这样一个难得的集会,让我能够和这么多中国语学界的专家朋友们欢聚一起,交流学术,畅叙友情。我有一个想法:学术事业是不分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崇高事业。学术研究的成果,无疑应该作为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而为大家所共享。

我是在樱花盛开的美好季节踏上你们充满友谊的国土的。两个多月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深感到贵国对于汉语的研究有着雄厚的力量和坚实的基础。你们的研究工作劲头很足,功力很深,成绩很大。众所周知,咱们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两国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更是异常的密切。你们长期以来在汉语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所珍藏的大量文献,一直受到我国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已故仓石武四郎教授、吉川幸次郎教授等著名汉学家的著作,在我国学术界是很熟悉的。波多野会长先生和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藤堂明保教授的许多大著也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今天到会的许多学者,都是对汉语研究造诣很深的。你们的研究成果大大地丰富了汉语的学术宝库,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莫大的鼓舞!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应邀到贵国大学从事汉语教学、研究的人,有幸和各位相处在一起,共同切磋学术,交流心得,发展友谊,我感到特别高兴。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多多得到各位的指教和帮助。

在我动身来日本以前,曾经拜访过几位老一輩的语言学者,如吕叔湘先生、王力先生等。他们都嘱咐我向日本语言学界的学者们朋友们致意问好,祝愿大家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王力教授已经是八十高龄了,但他还没有退休,仍然在著书立说,培养人才。今年年初,他老人家在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了一首很能体现他的心情的诗,请允许我

在这里给各位念一念:

星移斗转又新年,酒饮屠苏意盎然。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从知大难能添寿,喜见中兴复尚贤。
前路光明远景美,河山壮丽艳阳天。

王先生诗中抒发的这种“人老不服老”的精神,可以说是我国许多老一輩学者的共同特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科学文化事业非急起直追不可。许多年逾古稀的学者,就是这样恨不得自己能多活几年,能够“还将余勇写千篇”,为发展学术事业多作贡献,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波多野会长要我在这里谈谈我国汉语研究的情况,我接触的情况不多,了解得很不全面,只能根据一鳞半爪的材料,结合个人的点滴体会,给各位作个粗略的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三十一个年头了。三十年来,我国的语言研究工作,也和其它学术领域一样,走过了曲折起伏的道路。在这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语言研究和语文工作有过比较繁荣发达的阶段,也有过备受摧残,停滞不前的阶段,而现在,正处在重振旗鼓,恢复发展的阶段。回顾三十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历程,也许可以大体上归纳为蓬勃发展、备受摧残和恢复发展三个阶段。

一、蓬勃发展,一片兴旺。

建国后的头十七年,是我国语言学蓬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阶段。在这十七年中,语言学工作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从毛主席、周总理到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都非常关怀我国的语言工作。中央领导部门还专门制订了各项语文工作

* 本文是我校中文系詹伯慧同志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日本中国语学会演讲会上的一个讲话。全文曾在日本中国语学会主办的刊物《中国语学》第277期上刊登。

的政策，为大力开展语文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早在建国初期，《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等重要社论，号召举国上下都来关心语言工作，给语文工作者以极大的鞭策和鼓舞。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在语言研究和语言实践方面陆续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起来的。发展速度之快，取得成绩之大，远远超过解放前的几十年。下面我们举几个方面的事例来看：

1. 加强领导，充实机构。

解放后不久，就先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语言研究室），成立了直属国务院领导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2年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4年12月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随着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等工作的开展，1956年年初又在北京分别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和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郭沫若）有了这些专门的机构，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一系列工作，得以在全面规划、统一领导下有目的，有步骤地顺利开展。

2. 开办专业，培养人才。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培养语言研究和语文工作的人才，教育部门首先在高等学校的语文系（科）中普遍开设语言学方面的课程，设立语言（或汉语）教研组（室），加强语言教学，逐步扭转中文系（科）一贯重文学轻语言的倾向。综合大学中文系和师范院校的中文系（科）都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列为必修的基础课程，外语系（科）也都开设了“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还开设了“汉字改革”“汉语方言学”、“汉语史”等专门的课程。

为了适应语言工作的急迫需要，建国初期北京大学中文系就办起了语言专修科，随后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教育部又把全国唯一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集中雄厚的语言学师资力量，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了汉语专业。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北大汉语专业向全国输送了一批批语言学的生力军，在各地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骨干作用。与此同时，各民族学院也在语文系中加强语言学方面的训练，培养从事民族语

文工作的人才。

根据粗略的估计，到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已经有了一支一千人左右的语言研究队伍，大部分散布在各高等院校从事语言研究和教学工作。

3. 三大任务，方向明确。

新中国的语言工作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要使语言研究能够直接间接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建国不久，党和政府就明确提出了语文工作的三大任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汉语规范化、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围绕这三大任务，从五十年代起语言学界就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对有关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和研究。为了交流情况，制订规划，研究措施，把三大语文任务搞好，一九五五年秋天连续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开幕）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开幕）。这两次会议对于语言工作的开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制订的措施，迅速得到贯彻落实，《人民日报》和各地报刊也密切配合，大力宣传，使三大语文任务深入人心，语文运动蓬勃开展。在这以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语言工作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汉语方言普查、语文书刊出版等方面成绩比较突出，下面分别略作介绍：

4. 文字改革，阔步前进。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文改工作迅速发展，汉字的简化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讨论、推广工作双管齐下，上下结合，全面开花，收效很快。

在汉字简化方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早在1955年1月7日就公布了“汉字简化草案”征求意见，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期间，代表们广泛讨论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会后上报国务院审议，国务院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二月一日起，简化汉字正式在全国推广使用。据一九六四年文改会编的《简化字总表》，前后分批公布使用的简化汉字共有二千二百三十八个。

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一九五五年十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以后，初步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三个月后，一九五六年二月九日文改会正式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经过广泛

试用和征集意见以后，同年八月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又发表了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见，九月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发言，十月十日，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张奚若、胡乔木任副主任，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订，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审订委员会通过了“修正草案”，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十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汉语拼音方案》的社论，随后《文字改革》月刊发表了文改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说明，以及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解释和资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十二月十六日开办了拼音字母教学讲座，一个宣传汉语拼音方案，学习汉语拼音方案的热潮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一九五八年一月，全国政协派出六个宣传组到各大城市宣传《汉语拼音方案》，二月三日吴玉章主任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之后，就在这次人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至此，前后经历三年，反复征求意见，反复审议讨论，终于完成了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任务，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家一项重大文教措施付诸实行。

5. 推广普通话，声势浩大。

推广普通话是三大语文任务之一，又是汉字改革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大工作。周恩来总理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在全国政协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时，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是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

自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推广普通话工作就在举国上下一呼即应，全面铺开了。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成立，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力推广普通话》的社论，接着，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陈毅同志主持下于三月十二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机构、有关部门如解放军总政治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文化部、交通部、铁道部、广播事业局、总工会、团中央等都分别发布指示，要求所属单位贯彻文字改革精神，大力推广普通话。

新闻、广播、出版等宣传部门大力配合，由教育部、广播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普通话语音教学广播讲座”也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开始向全国播讲。与此同时，为了培训推广普通话的骨干力量，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也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开学，各地响应中央号召，纷纷办讲座，编读物，学习普通话，推广普通话蔚然成风。一些方言比较复杂的地区，迎难而上，创造出不少优异的成绩来。地处福建山区的大田县，属于闽方言区，语音与普通话差别很大，可是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广泛发动了群众，在学习普通话推广普通话中成绩显著，成为推广普通话的一个榜样。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是奇迹，也是宝贵经验》的文章，报导了大田县的先进事迹，八月二十六日福建省在大田县召开了推广普通话的现场会议，大田的典型事迹迅速在全国广泛传播，推动了方言地区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为了及时交流总结教学普通话的经验，表彰先进，树立榜样。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第一次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开幕，陈毅副总理到会讲了话，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全体代表。第二次、第三次观摩会分别于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夏天在上海、青岛举行。随后停了几年，一九六四年夏天又在西安举行了第四次观摩会。每次全国观摩会举行以前，各省(市、自治区)都先期举行全省的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有的地方还在省观摩会前开了地区、县的观摩会，层层选拔，把最优秀的代表和成绩送到全国观摩会上去。这些观摩会上表演的节目大都录了音，在中央和各地广播电台广播，有的还拍了新闻记录影片，扩大了宣传的效果。

6. 方言普查，成绩不小。

为了做到“知己知彼”，了解方言和普通话的异同，以便更有效地开展普通话推广工作，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汉语方言的普查工作，中央高教部和教育部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联合发出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内抓紧完成方言普查任务，以促进普通话的推广工作。随后，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相继成立了有关领导机构，制订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计划，迅速开展了以高等院校中文系师生为主力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这次方言调查虽然

只是初步的调查,主要调查方音情况,但其面之广,其规模之大,都是汉语方言研究史上没有先例的,为了充实这次普查的力量,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第一、二期的培训内容,都把方言调查的训练作为重要的一环,要求学员认真学好调查方言的技能,每人记录整理一遍自己的家乡话。这批学员经过比较严格的方言调查训练以后,回到本地,既是推广普通话的骨干,也是方言普查的重要力量。

这次大规模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大致只花了两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以一个县(市)为一个点的普查任务,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普查所得的材料编写各地学习普通话的手册,随后又转入了总结普查成果,综合整理普查材料,编写各省(自治区)汉语方言概况的工作。据有关方面的了解,当时全国除西藏外有县(市)数目二千二百九十八,已普查汉语方言一千八百四十九点;各省(自治区)随后编出三百种以上的“学话手册”(或“××怎样学习普通话”),其中已由各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有七十二种;各省(自治区)编出的“方言概况”一类综合性调查报告有十八种,除少数几种已公开出版或发表在刊物上外(江苏和上海、河北、四川、安徽),其余有十一种是未正式出版的石印本或油印本(个别也有铅印的),有三种已写成稿本而尚未印行。这一批方言普查的成果,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也是很宝贵的资料。拿上、下两大册,字数一百多万,《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来看,其材料之丰富,在闽方言研究史上可谓空前,对于深入研究在汉语方言中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闽方言来说,其参考价值是比较高的。

7. 语文书刊,大量出版

建国后不久,在北京、上海等地就陆续办起了十多种语文书刊。其中最早出刊的要算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主编的《新文字周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创刊,一九五一年五月改为《新文字半月刊》,一九五二年改为《语文知识》月刊),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办的《中国语文》杂志创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语言学界最有影响的一份期刊,在它的创刊号上,吴玉章同志题词“广泛地征求意见,虚心地研讨学术,切实地解决问题,通俗地说明道理。力求真实,切戒浮夸”。这大概就是当时《中国语文》的编辑方针。随后,陆续创办了《语文学习》、《语言研究》、

《文字改革》等刊物,《光明日报》也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创办了《文字改革》双周刊。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不定期的“丛刊”,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的《语言学论丛》、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辑的《方言和普通话丛刊》、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的《方言与普通话集刊》、以及《语言学论丛选译》等等。据统计,到文化革命前为止,全国共有语文书刊十多种,发表在各种刊物上有关语文书方面的论文,在八千篇以上。

在语文书刊的出版方面,十七年来共出版发行了上千种各种类型的语文书刊,其中有不少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为了提高语言教学水平,从一九五六年起,高等教育部组织部分高等院校语言学教师,陆续编出各门语言学课程的教材及教学大纲,“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语言方面的基础课,到五十年代后期,都有了经过集体编写,反复讨论修订后出版的通用教材。

解放前我国没有专门出版语文书刊的出版社,建国初期,语文书刊分散在商务印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东方书店、五十年代出版社以及各地方出版社出版。随着三大语文运动的蓬勃发展,语文书刊的出版量不断增加,文字改革委员会办起了一个专门出版语文书刊的文字改革出版社,自一九五六年六月成立以来,十年间文改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语文书刊,从薄薄的汉语拼音课本到五十万字的《汉语方言概要》,深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

上面粗略介绍了建国头十七年中我国语言研究和语文书刊工作蓬勃发展的一部分情况。在此期间,围绕着三大语文工作的开展,语言学界还对一些语言理论问题和语言具体问题开展过热烈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例如对汉语语法中的词类问题、主语宾语问题,对语言理论中的语言有没有阶级性问题,语言发展的内因外因问题,以及对汉语规范化中异读词规范问题,普通话词汇规范问题等等,都有过一些探讨。此外,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对语言学史、汉语史、古文字、古音韵等学术领域中的一些问题的研究,也都取得了一些成果,出版了一些专著。

二、备受摧残,停滞不前。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整个科学文化领域遭受了空前的浩劫,语言工作自然也备受摧残,不能例外。文化革命期间,语言研究和语文书刊陷于停顿,万马齐喑。“四人帮”一个黑干将文革初期跑到

某大学去放毒，竟对学习汉语专业的学生说：“中国人还学什么汉语？”真是无知而又无耻！中国人不学自己祖国的语言，难道汉语专让外国人学习，专让外国人研究，在那样一个“四害”横行的时期，我们的语言学家不能从事研究，不能从事教学，当时的情景，各位可想而知，我想不必多费口舌了。我只想举出一点，就是前面谈到过的，五十年代那次全国大规模方言普查所得的素材，无疑是相当丰富的，可是，那些材料据最近的了解，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散失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四人帮”毁灭文化，祸国殃民，他们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关于这十年间语言工作备受摧残的情况，《中国语文》编辑部一九七八年四月在苏州召开的“语言工作者批判”两个估计”、商讨语言科学发展规划的座谈会上有过不少反映。那次会的一些发言，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文革期间语言研究工作遭到灾难性的破坏，语文水平普遍下降的情况，有力地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当时有的语言学家身体受到折磨，资料大量损失，甚至连几十年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也付之一炬，多么的伤心啊！王力先生诗中有“从知大难能添寿，喜见中兴复尚贤”两句。这“大难”二字是很概括的了。王先生在文革期间自然也是备受折磨的，要不是乐观豁达，又怎能活到今天，有幸在晚年“喜见中兴复尚贤”呢！我们这些五十上下的人，文革期间正是三十多岁，做学问的“黄金时代”“锦绣年华”啊！可就是这样白白地糟蹋了不可挽回的十年宝贵光阴。十年，对于一个人已经是不少的了，对于整个语言学的发展，丢掉了十年的时间，损失之大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悠久的历史，从事语言工作的人本来就不是很足够的，经过这十年的浩劫，自然难免带来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困难。文革以后，老一辈的语言专家已经越来越少，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了。中年语言工作者象我们这样岁数的稍多一点，但由于十年没有钻研业务，有很大的一块“空白”，得费相当大的力气才能补上啊！拿我自己来说，前几天看到东大开列了一张我的“著述”的清单，看来我发表过的东西算是不不少的，可是，把这张清单仔细看看，那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前期那几年写的。那时候年纪青，精力足，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空气浓，自己脑子里经常想些语言上的问题，有一孔之得，就动笔写起来。但毕竟还是学识浅薄、羽毛未丰，写出来的东西，实在谈

不上什么学术水平。令人痛心的是正当自己想认真多读点书，多研究点学问的时候，就来了个文化大革命，不但读不成书做不成学问，还因为过去写了几篇文章，被打成“白专道路”的典型，这真是啼笑皆非，从何说起。总之，这一段难忘的历史，这一篇重要的教训，是永远也要记取的。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要不是党中央拨乱反正，给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结论，我们的语言学，我们的三大语文任务，恐怕从此休矣！今天咱们恐怕也不可能欢聚一起，交流学术，畅叙友情。

这备受摧残十年的情况，恕我就谈到这里吧！

三、恢复发展，日渐繁荣

打倒“四人帮”，全国喜洋洋。我国语言学重新获得了生命，语言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发展。三年多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有了党的正确政策路线的指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语言科学就一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如果“四人帮”不打倒，任由他们横行霸道，为所欲为，那还有什么语言学的发展可言呢！

这几年我们首先深入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摧残破坏语言研究和语文工作的罪行。分清是非、肃清了流毒、激发起语言工作者重整旗鼓、迎头赶上的热情来。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三年来整个语言学界是比较活跃的。主要表现为：文字改革工作逐步开展、恢复增设了一些语言研究机构，充实了语言学的专业队伍，扩大了语言研究领域，恢复并新办了一些语文刊物，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开展了许多学术活动，提高了学生语文水平，制订了学科发展规划，加强了组织领导，进行了国际交流等等。目前语言研究风气日渐浓厚，社会上对语文工作也更加重视，可以这样说，经受十年风霜的中国语言学，已是枯木逢春，新枝再发，有了繁荣发展的良好开端了。

下面就其中几个方面向各位介绍一点几年来恢复发展的情况：

1. 文字改革工作的继续开展

打倒“四人帮”以后，文学改革工作及时排上议事日程。1976年年底和一九七七年年初，《光明日报》《文字改革》副刊连续发表了几篇揭发“四人帮”破坏文字改革罪证的文章，《人民日报》也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发表了文改会文章《批判“四人帮”破坏文字改革的罪行》。就在这一年里，文字改革委员会草拟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于一九七七年

十二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报纸上发表,广泛征求意见。《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加快文字改革工作的步伐》的社论,全国政协也在一九七八年四月组织部分在京委员座谈了这个《草案》,《草案》第一表的二百四十八个字即在报刊上试用,经过近一年的试验,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需要对《草案》进行修订改善,后来就停止试验,进入研究修订的阶段了。据了解,目前《草案》的修订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待报国务院审议后即可发表。

在草拟和修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同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逐步开展。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文改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汉语拼音广播讲座”,开播前由王力、周有光、徐世荣三位语言学专家讲话,介绍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针和推行汉语拼音的意义,八月教育部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高教局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也恢复开展起来。从一九七八年年底到一九七九年三月,先后有湖北、山东、浙江等省恢复举行了全省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文改会、教育部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在杭州联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推广普通话工作汇报会,经过一番准备,停止了十五年的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八月于北京胜利召开了。这标志着推广普通话工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五十年代“人人学习普通话”的风气将继续提倡,继续发扬。为了培训推广普通话的骨干,一九七九年二月文改会、教育部和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又在北京联合开办了普通话研究班,第一期于六月三十日结业,接着又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开办了第二期。

近几年来,我国文改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合作,参加了联合国地名标准化的会议,一九七七年九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我国提出的关于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中国地名作为国际罗马字母拼写标准的决议。在这以后,我国地名标准化工作迅速开展,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我国对外文件译文均改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人名地名。

适应文字改革工作发展的需要,不久前国务院作出了加强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决定,增补了马大猷、王竹溪、朱德熙、陈翰伯、张友渔、张志公、周有光、钱伟长、倪海曙、曾世英等十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并决定由董纯才任文改会主任委员,

胡愈之、张友渔、吕叔湘、王力、叶籁士为副主任委员,倪海曙为秘书长。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文字改革工作正在有计划地逐步开展,汉字拼音化的研究实验也逐渐引起大家的注意,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字改革机构也已恢复组建,高等学校的文字改革课程也在加强协作,正在编写一部通用的汉字改革教材供教学使用。

2. 研究机构的恢复和增设

近几年来,各地原有的语言文字研究机构纷纷恢复,还新设了一些研究机构。目前散布在各省和各高等院校的语文研究机构有: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安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南京大学语言研究室,山东大学语言研究室,厦门大学汉语语言研究室,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新疆语言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语文研究所,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室等。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民族语言研究室,共有语言文字专门研究机构十三个。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可说是全国语言研究的中心,该所所长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语言研究室规模也较大,该室对国内几十种民族语言进行研究,由傅懋勤先生主持。

3. 语言学会及专科学会的建立

近两三年来,随着语言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各地纷纷筹建语言学会或语文学会。到目前为止,已成立学会的有:上海、天津、黑龙江、河北、山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新疆、山东和北京。山东和北京的语言学会都是最近才成立的。此外,尚未成立语言学会的吉林、江苏、浙江、福建、河南、四川等省都在积极筹备,预计今年之内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成立语言学会。全国语言学会也在酝酿之中,定于今年秋天成立。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已在一九七九年四月成立,傅懋勤先生任该会会长。

近年来还成立了一些全国性的专科学会,如古文字研究会、嗓音研究会、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文字现代化研究会等;训诂学研究会,音韵学研究会,高等学校汉语方言研究会、高等学校文字改革研究会民族古文字学会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等也在筹建之中。

各种语言研究学术团体的建立,对于组织开展本学科的学术交流,协作进行某些科学项目的共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 研究队伍的扩大

据不完全的估计,现在全国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大约有三百多人,分布在各高等院校从事语言教学及研究工作的人员约一千人。此外,还有大约三百人的业余语言研究者。

从一九七八年全国恢复招收研究生以来,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两年内全国共招收了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生二百多名,这是语言学界一支重要的后备力量。目前,这批经过比较严格选拔的研究生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和各高等院校有关系、研究室(所)的语言学专家指导下认真钻研学习。

5. 语文刊物的恢复和增办

近几年来,除《中国语文》停刊十一年后已于一九七八年复刊外,还新办了好几种语文期刊,如《方言》、《民族语文》、《语文现代化》、《辞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教学》等,《方言》和《民族语文》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性季刊,向国内外发行。目前全国已有语言文字方面的刊物二十多种,超过了文化革命前。一些不定期的语言学丛刊也恢复或新办起来。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编辑的《语言学论丛》、文化革命前出过五辑,现在第六——八辑都已编好,不久将陆续和读者见面。湖北省语言学会新办的《江汉语言学丛刊》第一期也已在去年年底出版。

6. 学术会议的召开

几年来我国语言学界举行过不少学术会议,对于活跃学术空气,交流工作经验,调动积极因素起了促进的作用。已成立语言学会的省(市、自治区)大都举行过语言学年会,设有语言教学研究机构的高等学校大多举行过规模或大或小的语言学术讨论会,请有关专家报告研究成果,开展百家争鸣,内容比较广泛,涉及的范围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民族语言、语文现代化、古文字、古音韵、语文教学、语言教材、辞书编纂等等。据我所知,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就有:中国语文杂志社召开的“语言工作者批判‘两个估计’、商讨语言学科发展规划座谈会”(一九七八年四月苏州,在此以前还在北京召开过一次规模较小的同类座谈会),“现代汉语协作教材编审会”(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兰州、郑州),“第

一次中国地名工作会议”(一九七九年三月北京),“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经验交流会”(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五月南宁),“部分高等学校汉字改革教材协作会议”(一九七九年五月上海),“厦门大学汉语方言科学讨论会”(一九七九年六月厦门),“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八十诞辰座谈会”(一九七九年七月北京),“语言学概论教材讨论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乌鲁木齐),“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一九七九年八月北京)“噪音研究协会成立大会及学术报告会”(一九七九年九月北京)、“古文字研究会第一届、第二届年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长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广州),“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年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上海),“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第一次年会机器翻译专业分组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昆明),以及今年年初召开的“第三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北京)、“汉字编码问题会议”(北京)等等。此外,两部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几年来也分别在上海、青岛、黄山、苏州、武汉、成都等地召开过多次规模较大的编写工作会议,研究辞书编纂中的问题。这么多的语言文字学术会议接连不断举行,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少有的,这说明打倒“四人帮”后中国语言学界是活跃的,是朝气蓬勃的。

7. 辞书编纂工作的发展

近几年来辞书编纂工作在我国整个语文工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投入这方面工作的人力很多。周总理生前非常关怀辞书工作,他亲自批示的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一九八五年以前编纂和修订出版一百六十多种中外语文辞书,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其中中小型的汉语辞书如《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成语词典》、《四角号码词典》等都已在近年内分别编成或修订出版;《新华词典》也已编好,不久即可出版;《作文词典》、《现代汉语小词典》、《古汉语词典》、《同义词词典》等正在编纂中。修订后的《现代汉语词典》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的一部规范化词典;已印了八十万册,深受读者欢迎;《新华字典》近三年来就重印了二千二百五十万册,加上历年的印数,累计印刷量达八千〇五十五万册,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我国第一部方言与普通话对照词典《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的定稿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争取尽快和读者见面。

大型辞书的编纂工作近几年有了较大的发展。

《辞海》的修订前后断断续续经历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并充实了编委会，加快了修订的速度，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建国三十周年前夕完成了修订的任务出版发行。《辞源》修订工作几年来抓得很紧，修订本第一分册已于去年九月出版，其余三个分册不久也将陆续问世。近年来国家还重点抓了两部新编大型辞书《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汉语大词典》由华东五省一市负责编写，《汉语大字典》由湖北、四川两省负责编写，这两部大型辞书都已进入紧张的编写阶段，汉语大词典计划收词三十万条以上，汉语大字典计划收单字六万左右，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也在计划编纂另一部大型的辞书《现代汉语大词典》。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也在积极进行，第一卷《天文学》将于明年春天出版。

8. 语言研究领域的开拓

近几年来，我国有些语言学工作者与其它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哲学、逻辑学等的研究人员紧密配合，对某些语言学课题如社会语言学、儿童语言、语言与思维、语言与逻辑等加强了研究，还有一些语言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部门通力合作，着手对工程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生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大大扩展了我国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加强了薄弱环节，使我国语言学从广度上向前发展了一步。

9. 语文教学问题的研究

语文教学的改进直接关系到千千万万在学青少年语文水平的提高，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了促进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都成立了语文教学研究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及师范学院校密切配合，开展有关语文教学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学术探讨，组织语文教学讨论会，交流语文教学经验，举行语文竞赛，取得了不少成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亲自担任会长，叶圣陶先生任名誉会长，语言学界对此是很重视的。

10. 语言学专著的出版

几年来随着语言研究工作的恢复发展，陆续出版了一些语言学的专著，各地学术刊物和高等学校的学报也发表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问题分析》、郭绍

虞先生的《语法修辞新探》等，美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教授的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也已由吕叔湘先生翻译出版。此外，几年来还修订重版了一些文革前出版的语言学专著及教材，如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和他主编的《古代汉语》，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等。近年来由各地高等院校协作新编的一些汉语教材，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和张静主编的《现代汉语》，也都在去年分别出版。与此同时，三年来各地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一批通俗性知识性的语文读物，其中以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方面的为多。据粗略的统计，光是1979年，就发表了语言学论文约六百篇，出版了语文著作上百种。

11. 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

近两三年来，中国语言学界与各国同行朋友有较多的接触，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交换了彼此的研究成果。促进了语言科学的发展。仅就一九七九年一年的统计，应邀访问我国和进行讲学活动的就有二十几批三百多位，来自日本和美、英、法、南斯拉夫、荷兰、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其中以日本和美国的语言学者到访最多。在座波多野太郎先生，钟江信光先生、樋口靖先生，还有藤堂明保先生、桥本万太郎先生、香坂顺一先生、望月八十吉先生、池田武雄先生、金田一春彦先生、牛岛德次先生等，都在去年访问过我国，给我们带来了学术，带来了友谊。在座重水优先生不久前还在我国渡过了整整的一年，为我们介绍了在日本教授汉语的许多宝贵经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除此以外，单是去年一年，就有二百多位各国语言工作者到我国进行汉语的研究，如东京大学的研究生木村和岩田就分别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进修现代汉语。

近年来我国派出国外访问、讲学的语言学者也日渐增多。去年一年就有七、八批二、三十人。去年这个时候，我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李荣先生就在这里作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傅懋勛先生稍早一点也到这里访问。去年八月在丹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语音学会，十月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我国都派出了语言学者参加，他们都在会上宣读了论文。

这次我应邀前来东京大学从事汉语教学研究工作，最近傅懋勛先生又应邀前来东京外大亚、非言

(下转 72 页)

《燕京大学学报》发表张宗箴“释弭通弗说”以来，影响所及，几成定论，本文拟提出异议，供同行批评、指正。卜辞尚有一例，即粹924：“不雨？弗擒？其从犬‘口’擒有豚？兹用。弭从，允擒。”内容是殷王跟从管打猎专职人员（称犬）名‘口’的出猎，“验词”是“弭（比，训至）从，允擒。”如果否定了打猎，甚么能“允擒”呢？

本文第三稿于十年浩劫中曾辗转寄郭老请教，郭老赐函云：“我同意你的见解，确是比字，但此字可假借为袂，如你所引粹592首一字，释袂似颇妥当，供参考。”重订旧稿，已不能再获郭老指正，谨录郭老“释弭通袂”的提示以饗读者并借以感激前辈大师对后学者的殷勤关怀与教导。

（上接64页）

语文化研究所与贵国学者合作从事民族语言的研究，象这样频繁的学术交往，可以说是空前的。可以预见，今后我国和各国语言学工作者之间的交往必将更加频繁，我们热烈欢迎有更多的日本语言学者到中国访问，交流学术，增进友谊。

上面拉拉杂杂谈了一些我所了解的点滴情况。今天主要是谈汉语文工作方面的，有关民族语文方面的研究工作情况，我知道得很少，这里就不谈了。傅懋勤先生正在日本，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和领导，以后有机会可以请他介绍介绍。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语言学界是一派兴旺发达的喜人景象。据我所知，今年下半年还将有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要举行。例如秋天将要举行音韵研究的学术会议，筹备成立音韵学研究会；古文字研究会已预定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于成都召开第三届研究会年会，全国语言学会正在积极筹备，定于年内成立。还有，我国语文学界正在筹备庆祝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八十寿辰的学术活动，以叶圣陶、胡愈

之、吕叔湘、叶籁士、周有光、倪海曙等十五人为发起人，准备于八月二十日在北京隆重召开“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已发函国内外征集论文，准备编印《纪念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论文集》。王力先生的几部专著《龙虫并雕斋文集》、《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诗经韵读》、《楚辞韵读》都将在不久出版。

我国语言学在前进的道路上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困难，我们的研究人员还比较少，设备和方法还比较陈旧，学术水平还不够高，研究成果还不够多，一句话，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和国外语言学先进水平相比，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正在采取各种措施，虚心学习各国语言学方面的先进方法和先进经验，争取早日赶上先进的水平。我们希望通过全国语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能逐步实现我国语言研究的现代化，使我国的语言研究工作能更好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